

全球传播与学术创新研究丛书

总主编：张国良

跨文化视野里 我国环境新闻发展中的问题与超越



王积龙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球传播与学术创新研究丛书

跨文化视野里 我国环境新闻发展中的问题与超越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in China

王积龙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从跨文化视角研究我国环境新闻领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探讨超越的路径与方法。包括传统纸媒中的报业、新媒体互联网等媒介形态研究,涉及非政府组织、环境新闻记者等新闻生产领域,以及环境新闻教育、国际学术研究等学术领域。

本书可供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视野里我国环境新闻发展中的问题与超越/

王积龙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313-15488-0

I. ①跨… II. ①王… III. ①环境保护—新闻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2470 号

跨文化视野里我国环境新闻发展中的问题与超越

著 者: 王积龙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韩建民

印 制: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960 mm 1/16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5488-0/G

定 价: 4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4.25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52219025

转眼,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成立 10 周年了。

10 年前,为了加强文科建设,促进学科融合,把上海交通大学建成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应运而生。

相对于拥有 116 年历史(居中国第二)的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显得格格外年轻,正如师生们达成的共识那样:因其年轻,而充满活力。

10 年来,在学校领导和各界同仁的大力扶持下,在全体师生员工的非凡努力下,学院的教学、科研、创作、学科建设、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蒸蒸日上,生机勃勃,整体发展迅速,面貌焕然一新。

略举几个标志性的事实如下:

2007 年,被“中华传媒网”(中国大陆权威网站)评为全国 5 所“最具发展潜力的学院”之一;

2008 年,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跃居第 13 位;

2012 年,在 QS(世界大学排行四大榜单之一)学科排名中,跻身世界百强(中国大陆仅有 6 所院校)。

可谓:十载耕耘,春华秋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总结 10 年来的经验,最为关键的理念莫过于:以人(学生、教师)为本,争创一流(追求卓越、尊重规律)。以此为据,学院确立了以下办院方针:公正民主、求真务实、团结奉献、开拓创新。10 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学院不断进步的思想动力和制度保障。

为了切实有效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学院决定在各个方面认真反思不足、加大改革力度,以早日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学院的目标。

其中,就科学研究的层面而言,一个重要举措是,在教师历年成果积累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优化专著出版工作,突出时代性、系统性、科学性、交叉性。为此,结合“985”平台——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的建设,与交通大学出版社合作,郑重推出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与学术创新”研究丛书。

本丛书秉持好中选优、精益求精的原则,选定了第一批书目,共计8本,其显著特点为:发掘研究课题精粹,集纳优秀学者作品;引领时代发展潮流,满足社会进步需求。

我深信,未来10年,只要全院师生员工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媒体与设计学院将如鲲鹏展翅,飞得更高、更远,为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做出更多、更大贡献,在此过程中,本丛书也将发挥其重要功效。

最后,诚挚地期待广大学子和各界读者不吝指正。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 张国良

全球传播研究院院长

2012年11月15日

我国对于环境新闻的学术研究起步较迟,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逐渐扩展到传播学领域。环境问题催生出媒体的环境新闻,环境新闻在我国的发展是为了进一步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之需,是我国新闻传播业在理念与功能上的绿色转向。对于新闻传播领域的环境保护议题研究,现有的成果一是集中于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二是立足于本国具体的环境新闻与传播问题。这种格局的优势在于既要解决本国问题,又可借鉴国外经验。不过,这个领域的研究对话不多,范围很广,立足我国具体环境报道问题并参照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较少,事实上可参照的国际解决方案并不多。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起来,诸如环境传播、生态传播、环境新闻、环境保护新闻、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名称的研究,事实上相近的主体却有不同的角度,很多学者在日益细化的领域里不断耕耘,一时成果斐然。不过从一个体系角度去考察,会发现整合成系统的理论尚需时日,不仅有结构性的缺失,还有理论的深度与成熟度上的不足。当一种研究积累到一定阶段,基于一个框架对其进行整合无疑会对该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推动作用。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一个领域的理论体系从产生到完整乃至成熟,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

基于以上理由,此书尝试在新闻学的框架下对我国媒体的环境报道

进行多维考察,探究我国环境新闻在发展中的问题,并以国外经验为参照,形成跨文化的多维视角审视,试图为解决我国环境新闻的发展问题提供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本书共8章。第一章为中外环境新闻记者群体研究,第二至第三章主要从媒体形态上,即报刊业与互联网方面来探索我国环境新闻发展中的问题,并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案。第四章从社会学角度引入第三部门的舆论监督,即环保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新闻生产与舆论监督中的作用。第五章研究在华跨国公司的环境污染与舆论监督,涉及对环境殖民主义的舆论监督。第六章主要从思想上研究环境新闻与环保非营利媒体的特征等,还进一步以欧洲新闻学教育为切入点,探索新闻教育向后工业转型的径路与经验。第七章探讨我国环境新闻舆论归责问题,并进一步进行跨文化领域的面对面的对话,对环境新闻面临的多种问题进行宏观阐释与中西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第八章从国际学术研究层面来分析环境与健康议题在新闻传播领域研究的格局与趋势。本书总计涉及20个议题。目的是探索我国环境新闻发展中的问题,并从跨文化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因此,本书主要力求回答以下系列问题:

我国环境新闻记者群体主要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具有哪些人口学特征,他们从事环境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职业动力何在,他们面临着哪些主要的职业问题,并如何超越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国外同行的职业生存状况又如何?

我国报刊中的专门环境版面有哪些优势得以表现出来,还存在哪些问题,其报刊上的广告有什么特色与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综合新闻报刊上的环境新闻有哪些问题,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与应对思路是什么?

我国门户网站的绿色新闻有哪些优势得以显现,还存在哪些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如何;网络出版业的跨国污染主要表现是什么,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作为我国新环保法第五章中“三角舆论监督”(即政府-企业-公众)之一的社会组织(代表公众)之环保非政府组织,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经历过哪些阶段,各具有什么优势与特征,它与环境新闻生产与舆论形成有什么关系;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如何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可资借鉴的发展中国家经验与国际通行经验有哪些?

什么是环境殖民主义,什么是漂绿广告,如何鉴别与治理漂绿广告;以苹果公司在华环境污染事件为个案,本书剖析了环境殖民主义的表现与成因,并力求探索舆论监督的因应策略。

我国媒体环境新闻的理念与过去有哪些演变,与西方媒体理念有何不同。环保非营利媒体营运有哪些特色,社会功能有哪些优势;东欧国家脱离苏联模式以后如何转型的;欧洲新闻教育中的后工业转向情况如何。我们希望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发现背后的思想发展史,特别是绿色新闻思想的嬗变轨迹,以推进我国的绿色新闻发展。

为什么会有环境问题的报道以形成舆论,环境新闻并不一定能够形成解决问题的舆论,其原因何在,国际新闻界有何新解决问题的探索或尝试。我们也会在跨文化对话中探讨这些问题。

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里,环境议题的研究呈怎样的格局;因为与环境议题直接相关,健康传播领域国际学术界研究的格局与趋势又怎样;我们之所以另启一章作为本书的结尾,就是让读者了解国际研究的大格局与走向,其目的就是要拓宽我们的研究思路推动我国环境新闻与传播问题的解决。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环境新闻在西方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而我国才刚刚起步。本书作为问题导向性的研究成果,有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客观限制,又有理论水平、研究方法等水平上的问题,使得这本专著也会存在体系、观点、理论等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除了不断完善自身,作者也期待此书在本领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书材料的截至时间为 2016 年 5 月。有多位课题组成员对其中的内容有贡献,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的陈兑、纽约大学 SCPS 学院管理系的郭一阳、密歇根州立大学纳尔特环境新闻中心的黄康妮、英国林肯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宋琳、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的金子速、王舒瑶、何易、李菁文、朱倩等,都在材料收集与整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这里向他们致谢。

王积龙

2016 年 6 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外环境新闻记者的职业生存状况·····	001
第一节	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职业动力、问题及其发展径路·····	001
第二节	国外环境新闻记者面临的三重威胁及其成因·····	011
第二章	我国报刊业中环境新闻的发展问题及其分析·····	018
第一节	专业绿色新闻纸《南方周绿·绿色》的成就与问题·····	019
第二节	专业绿色新闻纸《南方周末·绿色》广告问题研究·····	028
第三节	我国地方综合类报刊的环境新闻发展现状与问题·····	037
第三章	我国网络绿媒体发展中的问题与应对跨国云端污染·····	049
第一节	我国门户网站绿色新闻出版现状——基于腾讯和搜狐的研究·····	049
第二节	全球网络出版污染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	059
第四章	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	067
第一节	我国 ENGO 的新闻传播与现实困境·····	067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 ENGO 在新闻生产中的经验与问题——以印度为个案·····	078
第三节	国际 ENGO 在新闻生产中的经验与问题——以绿色和平为个案·····	087

第五章	跨国污染与我国媒体的舆论监督应对机制	099
第一节	苹果公司在华环境污染的表现、成因与应对	099
第二节	环保类虚假广告的破解、鉴别与治理路径	110
第六章	嬗变与转型：跨文化视野里绿新闻理念的发展	119
第一节	从汶川大地震报道看我国媒体环境新闻理念的嬗变	119
第二节	美国媒体汶川大地震报道特色剖析	127
第三节	超越市场魔咒的新尝试：环保非营利媒体研究	133
第四节	从苏联模式到后工业社会理念——欧洲新闻学教育的 理念转型	147
第七章	我国环境新闻发展中的问题及其跨文化对话	167
第一节	环境新闻中舆论归责的生成、消退与再生	167
第二节	跨文化对话：环境新闻在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与 应对	174
第八章	环境与健康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研究中的格局与趋势	187
第一节	环境议题在国际学术研究中的格局	187
第二节	健康传播在国际学界研究的格局与趋势	198
参考书目		210
后记		216

第一章 中外环境新闻记者的职业生存状况

环境新闻事业的核心人群属于记者队伍,他们的职业生存状况、从业动力以及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所研究的首要问题。本章以国内与国外两个视点来分别研究环境新闻记者的职业生存状况、问题及其超越。我国的环境新闻记者研究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展开,属于一手材料,有很大的可信度;国外环境新闻记者研究着眼于文献梳理,优点在于多点展开,材料较为全面。

第一节 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职业动力、问题及其发展径路

从新闻传播的信息生产角度来看,我国现在从事环境传播的人员主要集中于媒体环境新闻记者与环保非政府组织(ENGO)成员这两大类人群当中。从理论上来说,前者从事大众传媒,后者主要从事人际传播活动,属于传播的不同领域。我们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对 98 份有效调查问卷基础之上^①,以此描述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现状、分析其中的问题,并探索问题解决的径路与逻辑。

一、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的动力系统分析

在环境传播从业者现状各要素的考察中,我国环境传播在年龄结构、知识层次与环保价值取向上有一定的优势;在环境传播从业者内部,环境新闻记者与 ENGO 人员初步形成良性互动。这些都是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所具有的积极

^① 数据来源于对我国从事环境新闻报道或与环保报道相关的记者、环保非政府人员的调查问卷,回收有效样本共 98 份,其中环境新闻记者 51 份,环保非政府组织人员 47 份。调查一方面以上海交通大学“环境保护新闻与传播”三届高端论坛为平台展开;另一方面数据来自于对一些非政府组织与媒体人员的零散调研。调研的主要时间点分别为 2010 年 12 月、2011 年 3 月与 2013 年 6 月。因为我国目前很难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专门从事环境报道的记者群体,ENGO 从业人员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故此样本不是随机的,本文主要侧重于对样本的描述性研究。在此之前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文献中还没有对这一从业人群的统计或描述性研究。

的动力特征。

(一) 从业者队伍的优势

从年龄结构来看,环境传播从业者以青年人为主体。从样本中环境新闻记者的年龄结构来看,20岁至39岁之间的记者比例为86.3%,青年人占据着主体地位。其中30至39岁这个年龄区间的人最多,占50.9%,超过总数的一半;20岁至30岁之间的青年人为35.3%。40至49岁的记者仅占9.8%,50岁以上占3.9%。ENGO成员也存在同样的优势,样本中20至39岁的从业者比例为74.5%,30至39岁的人达到53.2%。针对我国ENGO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的ENGO产生时间较晚,最早的一家是1991年成立的辽宁锦黑嘴鸥保护协会,后来才有1994年成立的自然之友等组织。然而真正有影响力是在引导公众参与怒江建坝、圆明园保护与北京动物园搬迁等一系列事件中。这是2003年至2005年的事情了,这些事件传播吸引了大批年青人的参与,ENGO也随之扩张影响力。到2004年春全国已经有3000家ENGO在民政部门登记^①。

我国之前只有《中国环境报》这样的政府专职部门主管的报纸坐拥环境新闻记者,但主要是以政策导向型的由上往下报道的方式为主。在我国的学术期刊网中,正式把“环境新闻”作为问题研究的是1999年《新闻采编》上的一篇研究环境新闻舆论功能的学术文章^②。之前的“环境新闻”无外乎是“××××年国内十大环境新闻”、“国际环境新闻组织成立”之类的消息,并没有从环境新闻本身特征出发研究本国问题的文献。因此,我国的环境新闻记者主要是200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受中国环境污染现实的影响,还有媒体、ENGO带领公众参与所造就的新的舆论环境。

有资深的绿媒体人认为2003年的科学发展观与建坝之争是环境传播与公众参与之发展的关键年份。这本由一些媒体人对怒江建坝项目质疑和审慎的态度而呼吁一些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决策过程,这一过程中媒体人特别强调公众参与,关键是“正”“反”两方面的知情权,这样才能发挥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南方周末》、《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均深入参与这一“正”“反”知情权的新闻生产与传播,与ENGO一起影响中央政府决策,“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③。我国正式以调查性报道成立专业绿新闻媒体的是《南方周末·绿色》,创立时间是2009年10月8日。与1986

① 刘海英,“努力着,困惑着,前进着——中国环保NGO媒体调查印象”[C].汪永晨,王爱军,守望 中国环保NGO媒体调查[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430.

② 李景平,环境新闻舆论的造势作用[J].新闻采编,1999[4]:34.

③ 汪永晨,“西部江河开发与公众参与”[C].汪永晨,改变 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6年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7:139.

年成立的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意义不同,不是把一群政策性的记者聚集在一起,《南方周末·绿色》是把以问题为导向的调查性报道作为新闻生产主要形式的绿媒体。一大批有理想、有责任感的年青环境新闻记者就是在这样一些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从样本数据来看,目前的环境传播从业者 in 知识结构、经济水平与价值取向上都有当今积极的时代特征。在知识结构层面,环境新闻记者 100% 都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其中,有硕士学历的记者达到 31.4%,具有本科学历的为 68.6%。在这群环境记者中,在环境新闻领域工作时间都比较短,其中具有 6 年以下从业经历记者占 68.8%,这里 1~3 年从业时间的为 33.3%,从业时间在 10 年以上的环境记者仅占 3.9%。调查还发现,在从事环境新闻记者职业之“最大的动力来源”的选项中,有 94.1% 的记者选择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太严重,尽自己努力教育公众使情况逐步好转”的选项;仅有 5.9% 的记者选择了“信仰环保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较为中立的选项。

从 ENGO 的角度来看,与记者大体相当又各有不同。从知识结构上来看,本科学历的 ENGO 人员达到 53.2%,硕士占据 19.1%。本科以上达到 72.3%,占据主体地位。但与环境记者不同的是,ENGO 人员里还有 27.7% 的大专及以下学历者,其中大专比例为 17.0%,高中、中专比例为 10.7%。其原因在于,环境新闻记者多受雇佣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媒体部门,对学历的要求比较高;环保组织出自民间多具有草根性质。不过 ENGO 人员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者达到 72.3% 的比例已经相当高(由于样本所限,实践情况可能比这数据要低得多)。ENGO 人员多数从业时间较短,从事 ENGO 工作在 1~3 年间的比例为 44.7%,将近一半;从事此行业达 10 年以上的比例仅为 12.8%。ENGO 人员从业动机里,有 78.7% 的人员比例“最大的动力来源”来自“我国的环境污染太严重”;有 14.9% 的比例“看中非政府组织的前途”;有 6.4% 的比例“信仰环保的生活方式”。

从总体样本统计数据来看,目前环境传播从业者是一群以青年人为主的队伍,他们高学历、从业时间短、有历史责任感且敢于直面当前的环境问题。这些特质与西方经历了半个世纪环境运动的较为保守的环境保护群体不同,我国从业者表现出年青人的朝气和理想,是我国环境传播事业里重要的动力系统之一。

(二) 环境新闻记者与 ENGO 人员的良性互动

环境新闻记者与 ENGO 人员有多方面的良性互动。我们的调查显示,环境新闻记者对 ENGO 有多方面的依赖,特别是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在环境报道采访阶段的取证阶段,ENGO 是环境新闻记者首选的被咨询对象。在“如

果遇到环境污染的取证问题,您最有可能咨询的是谁?”的问卷调查里,有58.8%的环境新闻记者选择了 ENGO 成员,有23.5%的记者选择体制内的科学家/专家,有17.7%的记者选择企业里的科学家/专家。同时,环境新闻记者也把 ENGO 成员作为对抗来自非正义污染方及其利益相关者压力的重要联合对象。在问及“如果您在报道污染时遇到压力,您最有可能联合”(可多选)的选项中,ENGO 以微弱劣势(52.9%)排在其他媒体(58.8%)和公益律师(58.8%)之后,比例居于环境受害者(47.1%)之前。环境新闻记者对 ENGO 的科学数据之信源的使用也有一定的信任度(可多选),有54.9%的环境新闻记者常使用 ENGO 的数据,低于政府部门(86.3%)、学术机构(78.4%)与亲身调研(56.9%)的数据,但与国际机构 IPCC 等部门报告持平,高于国内媒体之信源的29.4%,也高于国外媒体的25.5%。可见环境新闻记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对 ENGO 作为科学信源表现出很高的信任度。

环境新闻记者与 ENGO 人员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因为 ENGO 人员也同样需要媒体与环境新闻记者。调查数据显示,当 ENGO 人员在监督污染事件中遇到阻力时,有93.6%(可多选)的受调查者选择了联合媒体,接下来才是公益律师(53.2%)、受害者(42.6%)与环保部门(19.1%)。在新闻生产与传播领域,ENGO 也对媒体有相当的依赖。调查问卷显示,ENGO 从事环保最主要的形式(可多选)是与大众传媒联合(40.4%),其次是自办网络/纸媒宣传(31.9%)与现场调研与宣讲(31.9%)。

从业界的实践来看,这些良性互动现象有其背后的动因。新闻记者与媒体有着广泛的人脉与影响力,作为中国最早环境新闻记者之一的《中国环境报》熊志红认为环境新闻记者可以为 ENGO 成员提供特殊的沟通渠道,借助媒体扩大影响力进而引导公众支持与参与是发展壮大 ENGO 的一条智慧之路。2005 年环保联合会的数据显示,79.4%的 ENGO 被媒体报道宣传过;90%以上的 ENGO 经常组织公众参与民间环保活动^①。媒体对于 ENGO 之所以重要,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也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这样一个法律专业的 ENGO 之专业知识性很强,在维权活动过程中与媒体合作既可以向公众大面积普及法律知识,提高 ENGO 的社会影响力,也可以利用媒体提高 ENGO 的舆论监督作用,限制污染企业的行为;还有监督政府、司法等职能部门在执法中的行为,达到推动法律途径解决环境问题的进程^②。

① 刘海英,张冬青.中国环保 NGO 与媒体:携手同行[C].汪永晨,改变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6 年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7.

② 刘海英.中国环保 NGO 与媒体的合作[C].汪永晨,熊志红,关注环境记者沙龙讲堂[M].北京:三联书店,2009.

环境新闻记者之所以也需要 ENGO, 决定于中国这样的媒介环境, 即使像《南方周末》这样有影响的媒体也不例外。该报前环境新闻记者刘鉴强认为绿媒体的生存环境非常虚弱, 若没有强大的资源环境新闻记者很难保障其在媒体中的地位。核心信息源需要强大的关系网, 环保局之类的信源对新华社与人民日报这样的记者有天然的优势, ENGO 就是环境新闻记者的天然盟友。又因为受害者容易过度夸大事实, 主管部门更容易封锁消息, 比之社会化管理角色的 ENGO, 媒体记者更容易与 ENGO 联合(刘海英, 2009, p45)。从专业知识、人脉与促进公众参与方面, ENGO 相对媒体人都有一定的优势。

二、我国环境传播从业者的主要问题与成因

从调查数据也显示现有的环境传播从业者面临着的一些问题, 当中环境新闻记者与 ENGO 人员会有所同也会有所不同。从二者问题的共同性来说, 其发展皆面临着专业知识欠缺与体制方面的约束; 不同点在于环境新闻记者面临的问题更倾向于专业领域, 而 ENGO 则更多体现出体制性困境。

(一) 环境传播从业者的专业困境与成因

首先是专业知识缺乏的困境。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 环境传播从业者当中环境科学知识的匮乏是一种普遍现象。样本中环境新闻记者之专业背景里新闻传播学以 45.1% 的比例占据将近一半的比例, 其他文科以 31.4% 的比例处于第二的位置; 文科总计占据环境新闻记者总数之 76.5% 的比例。有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背景的记者仅为 3.9%, 其他理工科学科背景的比例 19.6%。也正是这个原因, 样本中有 25.5% 的记者觉得在业务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采访中专业知识的不足。这也进一步暴露出我国大学环境新闻教育领域的缺陷。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 有 49.0% 的环境新闻记者认为其环境方面的科学知识都是在职业生涯而不是大学里面学习到的; 31.4% 的记者认为这些专业知识主要是向专家学习得来的; 仅有 15.7% 的记者认为环境专业知识主要来自于大学阶段的学习。这些数据显示, 我国目前的环境新闻记者多数都没有接受正规环境科学知识的教育, 这和我 国大学没有环境新闻教育有关。在西方如美国就有这类针对环境科学与新闻学的交叉学科教育。

在 ENGO 人员领域也具有类似的困惑。这群从业者中文科背景的比例为 42.6%, 理科为 57.4%。很明显地看出, 在 ENGO 从业者的学科背景中, 科学素质明显高于环境新闻记者群体, 记者群体里文科背景总计占据 76.5% 的比例。但 ENGO 人员里, 具有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背景的比例为 12.8%, 其他理工科背景的从业者比例为 44.6%。在文科背景里, 新闻传播学科还是占据着 17.0%

的比例。有相当一部分 ENGO 人员是由环境新闻记者转变而来的,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汪永晨后来成了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南华早报》的记者马军后来成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主任,冯永锋由《光明日报》记者变成了自然大学的创始人。这些人多是与新闻传播学、汉语语言文学等相关传统文科背景有关。因此,冯永锋就认为很多批评 ENGO 人员队伍是一群缺乏专业知识的“普通公众”,对“专业化很强”的环境保护根本没有权利说三道四,越是杰出的 ENGO 领导者(如汪永晨)就越是容易遭受这些“科学迷信主义者”的攻击^①。

有一小部分即 12.8% 比例的 ENGO 人员具有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的学科背景,并或多或少有媒体人经历。天天喜乐传媒人方玄昌就是一个拥有这样专业背景的 ENGO 从业者。他是吉林大学环境化学专业毕业,在《中国新闻周刊》、《财经》等媒体供职并从事环境与气候报道长达 10 余年,在 2012 年成为“知识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之一。但像方玄昌这样的环境科学领域的 ENGO 从业者只是凤毛麟角。调查数据显示,48.9% 的 ENGO 人员认为获取专业知识最好的途径是非大学的职业生涯学习;仅有 23.4% 的 ENGO 从业者认为获取专业知识最好途径是正规大学专业学习。因此,从专业背景来看,环境新闻记者与 ENGO 从业者科学知识获取途径异中有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大学教育中缺少针对环境传播从业者的教育。

其次,环境传播从业者科学数据的取证之难。作为环境新闻记者,有 45.1% 的记者心理上最大的压力来源于采访取证;相对于 ENGO 人员,这一比例仅为 12.8% 的比例。ENGO 人员更关心个人安全与被批评对象的报复,这种压力人数比例为 23.4%。科学与技术本身不是中立的,早在 1971 年的《布鲁克报告》(Brooke Report)首次官方承认对科学中立的社会支持在削弱,而在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怀疑科学的社会立场以及其中立性^②。因此,如果能够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拥有多样的新闻信息源,将会对科学报道有积极意义。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记者、ENGO 成员都是把我国环保部等政府机构报告/新闻的数据作为科学数据源(可多选)的首选,记者比例达到 86.3%, ENGO 成员为 61.7%。接下去 ENGO 人员与记者的科学信源使用有所不同,ENGO 对于科学信源的选择比例分别是其他环保组织为 57.4%,学术机构/学术杂志为 46.8%,亲身调研的比例为 44.7%,使用央视新华社等党媒的比例为 36.2%;记者的高信源使用比例分别为学术机构/学术杂志 78.4%,亲身调研者

① 冯永锋. 春天是同时到来的——2008—2009 年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现状调查[C]. 汪永晨, 王爱军. 参与 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8 年卷)[M]. 三联书店, 2009.

② Adam Barbara,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0, pp. 66-67.